

历史记忆不容磨灭

——大同煤矿“万人坑”见证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

本报记者 张志忠

觊觎矿藏 “万人坑”中的血色真相



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

当参观者走近坐落在煤峪口南沟的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一眼望去，山顶上密密麻麻的无字石碑令人触目惊心；步入纪念馆内，一张张照片、一幅幅史料，清晰地翻开了日本侵略者掠夺大同煤炭的史实。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到9月初，日本关东军及华北方面军就迫不及待分两路入侵山西北部，并先后侵占了大同矿区及周边煤矿；到1938年2月11日，大同煤矿正式由南满洲铁道

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从此日本侵略者对垂涎已久的大同煤炭资源实施了近8年“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与此同时，“满铁”在会社组织上不仅设有铁道部、地方部、商务部等部门，还下设了医院、学校、幼儿园、农事试验所、兽疫研究所等机构，意欲永久侵占并长期掠夺，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与贪婪。

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煤矿后，大肆抓捕劳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多产快出煤炭为宗旨，采取吃肥丢瘦、取易撤难的掠夺式开采方法，并以残暴的手段逼迫工人在恶劣的生产条件和严酷的生活环境下劳作。日本侵略者还在矿区设立宪兵队和矿警队，遍筑碉堡、岗楼并架设电网，以野蛮暴力手段管治矿工，矿工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劳作，致使大量矿工病残死亡，而这些被摧残致死或奄奄一息的矿工就被扔到荒郊野外、河滩山谷或废弃井洞中，日积月累形成了20处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以前对‘以人换煤’的概念很模糊，可现在看看这些无字碑，还有纪念馆玻璃柜下那些零散遗物，会突然意识到，这种痛苦曾经真实发生，如果没有这些证据，我们是不是早已忘记这里埋葬过多少冤魂？”看到这些最真实的史料，参观者无不感到悲痛万分。

寻访红色记忆 传承革命薪火



云冈区红色记忆馆。

在云冈区高山镇的街巷间，一座古香古色的院落静静伫立，门楣上“云冈区红色记忆馆”八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里曾是中共西大同县委县政府旧址，如今已成为大同地区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教育基地。近日，记者走进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建筑，探寻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感受红色精神的时代回响。

推开厚重的木门，吱呀声响中，时光仿佛倒流回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展馆以“矿山觉醒”为开篇，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段段凝练的文字记载，清晰勾勒出20世纪初大同煤矿工人的抗争历程。1933年6月，中共大同

特别支部正式组建，犹如暗夜中点燃的火种，照亮了劳苦大众的抗争之路。

移步至“矿山沦陷”展区，气氛愈发凝重。一张张触目惊心的老照片，无声诉说着1937年的黑暗过往。“1937年9月1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后，对矿区进行了疯狂掠夺和残酷统治。”讲解员指着一幅日军占领大同的老照片说，这里展出的每一件文物，都是那段血泪历史的见证。

“大怀左抗日”展区，通过场景复原、实物陈列，生动展现了大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英勇壮举。

走出历史的硝烟，如今的云冈区红色记忆馆不仅保存着历史的印记，更在新时代续写着红色传承的篇章。馆内常态化开展的红色教育活动，让更多人走进历史、感悟精神。正如展馆结束语所写：“历史如镜，映照来路。”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激励着大同儿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奋勇前行，让革命薪火在传承中焕发新的光芒。

本报记者 丁亚琴

光荣血脉永赓续

盛夏正午，云冈区平泉街道北秀苑社区，未叩门，一位老人已推门迎出，“快进来，屋里凉快！”门框上，“光荣烈属”四个红漆大字被阳光照得发亮，像一簇永不熄灭的火。

老人名叫张桂英，1945年出生，是烈士张喜宗最小的女儿。谈及父亲，她的眼角泛起潮湿：“母亲说我五六个月大时，他回来看过我们一次。”

“年纪大了，已记不清父亲具体是哪年参军的。”张桂英回忆道，“只听母亲说，父亲是主动报名参军。我的老家在浑源县，父亲就是从那里参加战斗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喜宗参军后，家里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两个哥哥给别人当长工，两个姐姐早早嫁人，母亲只能带着我四处乞讨度日。”张桂英说。

1946年11月，在广灵县战斗中，张喜宗同志英勇牺牲。“母亲得知噩耗后，整日以泪洗面，后来把眼睛都哭瞎了。”说起这段往事，张桂英的声音微微发

颤。父亲安葬在浑源县革命烈士陵园，每年清明，她都会带着子孙前去祭扫。“虽然记不清父亲的模样，但他为国捐躯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日子从灰扑扑的底色里一寸寸亮起来。政府按月送来700元优抚金，社区志愿者隔三差五上门送温暖。更让她欣慰的是，父亲留下的那团火，被一代代接了过去——大女儿、儿子、孙子相继参军，帽徽上同样闪着五星。他们都说，要继续保卫国家、守护人民。

午后，阳光透过纱窗，落在客厅那张发黄的烈士证明书上。张桂英把证书抚平，像抚平一段褶皱的岁月，“父亲没给我留下模样，却给了骨气。苦日子我们熬过来了，现在只剩高兴——为国家、为人民，值！”

门楣上的“光荣烈属”依旧鲜红。老人起身送客，背影瘦小，却挺得笔直，像一株不肯弯腰的秀木，静立在盛夏的风中。

本报记者 丁亚琴

疯狂掠夺 罪恶行径罄竹难书

缓步走过纪念馆内的折板式廊道，通过背景雕塑、幻影成像、场景再现等多媒体技术还原了当时的井下作业场景。

矿工们在煤尘缭绕，既无通风设施，又少安全措施的井下打眼、放炮、装车、推车。因采煤工作面不断扩大，而顶板支护稀少，井下经常出现大面积的塌方事故，矿工们的生命随时受到严重威胁。可即便这样，日本侵略者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和补充劳动力，大量使用童工，并下看风门、扳道岔、挂钩、打钟铃、推煤车、给机器注油等工作均由童工负担，以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为募集劳工，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沦陷区通过诱招强拐、野蛮抓捕、押解战俘、地区强征等形式向大同煤矿输送大量劳工。矿工被囚禁在整体由木板简易搭建而成的“大房子”里，屋内开有几个小窗口，但为防止有人逃跑，都被铁条或木板条焊死，就连上下井都由矿警队押送；房子里光线暗淡、空气污浊，通

常一间房子要住四五十人甚至上百人，人多地方窄，夏天闷热异常，汗臭、蚊虫、鼠蚁混杂交织，伤病横行，冬天木板无法抵御寒冷，只能死扛，致使大批矿工患病或伤残、死亡。

而煤峪口南沟“万人坑”是国内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坑内层层叠叠堆满了死难矿工尸骨，有的头颈被击穿，有的四肢被砍掉，有的张大嘴好像在呼救，有的仿佛挣扎着向洞口爬去，很多尸骨的姿势表明，他们是活着被扔进“万人坑”的。在尸骨清理中，工作人员通过遗物发现有姓名的共7人，其中来自江苏徐州的袁廷宣，1940年8月被抓骗到大同煤矿，他的遗物中有5张“采炭工賃单”，即矿工每月的工资单。袁廷宣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3.48日元，饭票扣去9.1日元，共济金扣去0.15日元，买鞋扣去2.85日元，剩余工资1.38日元。此后3个月他的工资逐渐降低，到第5个月，实领工资只有0.02日元，可能是因他在第5个月已经病倒不能劳作，不久后被抛入“万人坑”。

铭记历史 黑暗中的不屈抗争



市民、游客参观大同煤矿“万人坑”遗址纪念馆。

纪念馆里不光是对苦难的控诉，还有矿工们在黑暗中的不屈抗争。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的地区组织相继派苏兴、黑耀华等同志到大同领导矿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们通过整顿矿区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领导矿工武工队袭扰日军，惩处汉奸；在矿工中宣传党的敌对斗争政策，策反伪职人员，

帮助矿工逃离矿区；破坏机器设备、炸毁电厂、破坏运输铁路等，使日本侵略者的掠夺计划屡屡受挫。

同时，日本侵略者对大同煤炭资源的疯狂掠夺及对矿工的暴虐统治和残酷迫害，激起了广大矿工的愤怒与反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通过烧毁矿井、捣毁矿上地面建筑、掩埋器材、设法

逃跑等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抗争。走出纪念馆，再度沐浴在阳光下，压抑的心情与呼吸终于得以调整，但历史记忆不容磨灭，清醒地面对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铭记苦难更是为了自强不息。正如一位参观者说：“我们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历史成为照亮未来的灯。”

大同煤矿“万人坑”幸存者钱奎保

用余生讲述血色记忆



大同煤矿“万人坑”幸存者钱奎保近照。

92岁的钱奎保坐在家养养老院的床上，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头部的疤痕上。那道深褐色的印记像一条凝固的血痕，在岁月里刻下82年前的苦难。作为大同煤矿“万人坑”的幸存者，这位河南老人用清晰的思路和洪亮的声音，向记者还原了那段被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历史。

“1943年河南大灾，我们家9口被日本兵以‘招工’为名从河南骗了出来，”钱奎保的记忆从逃难开始，“他们说去安阳做工，结果把我们塞进‘闷葫芦’车，300多人挤一节车厢，人摞人，最后拉到了大同口

泉站。”下车后，他们被关进电网围着的大房子，随后被押往四老沟矿下井。

彼时刚满10岁的钱奎保，成了一名童工。“每天喝井下污水，吃的是掺沙子的窝头，大人们一个个倒下，就被拖去‘万人坑’。”他的声音微微发颤，眼角泛着泪光，“我的父亲干了一个月就累倒了，日本兵把他拖到院子里，在寒风里冻了4个钟头，活活冻死，最后扔进了‘死人坑’。”

父亲的死成了他记忆里最深的痛，而自己的“死亡经历”更加烙印般清晰。“那天给煤车注油，实在太累，就睡着了。”他摸了摸头的右侧，“日本兵一榔头下来，满脸是血，老乡们用烧过的烂棉花给我止血。”伤口发炎化脓后，昏迷中的他也被日本兵扔进了“死人坑”。

“腊月天，冻得快僵了，日本兵走了，我就往出爬。”他说，爬到矿工小路时昏死过去，是河北巨鹿县老矿工钱子明救了他，“养了半年病，由原来的王九香改名叫钱奎保，跟着恩人姓。”

如今，那道伤疤仍在提醒他：“我不是为自己活，是为那‘闷葫芦’车里的300多弟兄活，为千千万万被日本侵略者残害了的人活。”80多年来，他走过18个省



钱奎保家中的老照片。

市作宣讲，用亲身经历控诉侵略者的罪行。

“跟着共产党，有了工作，住上楼房，5个子女家家美满，”老人脸上露出笑容，随即又严肃起来，“只要活着一天，就得把真相说出去。这不是仇恨，是要后人记住。”

阳光移过他的白发，那道疤痕在光线下格外清晰，仿佛在无声地诉说：有些记忆，永远不能褪色。本报记者 辛雅君

本版摄影：韩望
创意设计：贺英